



# 点点滴滴汇成江河

## ——小记者爷王文采先生

撰文·供图 杨永

《王文采院士论文集》终于出版了，从计划到完成编辑出版2卷，共耗时6年之多，基本收录了王先生的毕生心血之作。当然，正如他的弟子、我的老师傅德志研究员所说，王先生是一部写不完的书。在论文集出版之后，王先生仍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分类学研究，最近，又有毛茛科、荨麻科等一些新分类群描述和发表。

特别说明一点，我称呼王文采院士为王文采先生，不同于一般的女士、先生之先生，而是我认为学问很高的老同志的尊称。动辄冠以院士头衔，一方面显得生疏，另一方面也无法表现出王

文采先生卓越的学术地位和和蔼可亲的待人接物作风。

1997年夏天我来到植物所，等到确定论文题目，已经是1998年冬季的事了。在此期间，碰到过王先生几回，但都是打个招呼，没有过多的交流。开始了解王先生，是我经常看到王先生拿着放大镜在标本馆看标本，边看边记录，很投入。我那时就想，这就是我要学习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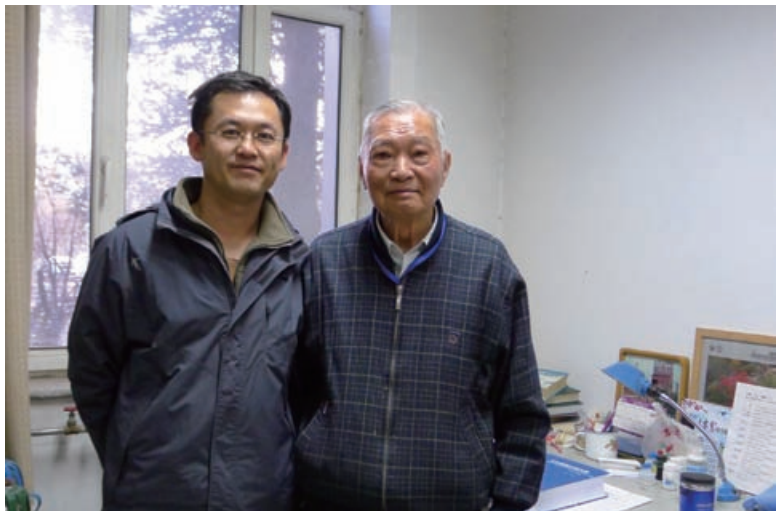
王文采先生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学者。《王文采院士论文集》编辑耗时较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先生的著述颇丰，从1950至2011年的62年间，共计发表论文

178篇，新名称1 285个，新种896个，而且绝大多数是王先生独立或第一作者完成的工作。这与目前许多科研论文的众多通讯作者、并列通讯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论文集还不包括王先生所编研的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等奖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以及《中国植物志》这样的志书内容。

王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我认为有几个原因。首先，王先生语言功底好，好多文章基本一遍定稿。他不会电脑，从来都是手写，我经常看到他的秘书孙英宝先生帮他录入文稿，整理他的手写材料。其次，王先生兢兢业业，

工作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倦怠。第三，王先生心态良好，与世无争，再困难的类群他也坦然应对。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能保持这样的心态，实属超人。

王先生从不居功自傲，而且待人和蔼可亲。王先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就是师爷爷级的人物，来植物所学习之前，就知道王文采院士的大名。以前没见过院士，总以为是很有范儿的那种。可多年接触和了解，完全没有看到过王先生摆大腕儿的架子。见到我，也总是称呼我为杨先生，搞得我很不好意思。不止是我，估计接触过王先生的人都有这个印象。我大学老师赵一之教授，早年编写《内蒙古植物志》也曾登门求教。王先生不仅提供了很多帮助，而且多少年来，两人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拉丁文是门“死”的语言，现在已经没有人讲这门语言，但却是植物分类学学术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在新分类群描述和命名方面，以及对早期文献资料的阅读和理解都十分重要。读博士期间，杨亲二研究员曾经给我们开过类似的课程。我2003年刚工作的时候，王先生决定给我和师弟王康再开个“小灶”，给我们上拉丁文课。约定好时间，周二晚上8点钟到他家。他总是会准时等在那里，客客气气地把我们迎进来，然后常常是准备几颗水果糖，我们吃着糖，他才开始讲课。这门课，我跟随王先生学习了两个月



王文采先生(右)和作者(左)

左右。面对面听师爷给我们讲授拉丁文的性、数和变格法，我们受益匪浅。虽然维也纳法规对描述新分类群已经不再要求使用拉丁文，但是，命名以及阅读前人的分类学文献仍然需要。将来的分类学研究人员还是需要学习这门“死”的语言。

王先生十分谦虚、严谨。他是个大院士，学富五车，做过种子植物很多个科的分类学研究，包括裸子植物的松科、柏科和被子植物的毛茛科、荨麻科、樟科和苦苣苔科等，但他总是很谦虚，很严谨。我知道他曾经做过樟科的分类学研究，和吴征镒院士曾一起发表过云南植物的考察报告，其中樟科植物是他做的研究。有一次，我去请教他樟科的分类问题。王先生笑着和我说，那是很多年前的工作，早就忘记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王先生就是这样子的。我开始学习分类

的时候，拉丁文不熟练，请他帮忙修改，他总是热情帮助，一般是当天拿走稿子，第二天就反馈给我。我请他共同发表，他客气地拒绝。我曾听过我的老师也提到类似的事。1990年的时候，傅老师弄好了他的新科——竹柏科的论文稿件，请王先生修改润色，并请他一起发表。王先生说，这是你的工作，我可以帮忙看看，但是你自己的学术论文要文责自负，我没做过这个研究，也不懂，我也不会挂名发表。其学术严谨可见一斑。

王先生性格随和，心胸宽广，治学格局宏伟，且做事严谨认真，正是“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最好的注脚，他对植物分类学研究的贡献和获得的巨大成功正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他的成就在植物分类学界屈指可数，他也是我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责编 桑新华)